

譯者的操縱：從 *Cuore* 到《馨兒就學記》

陳宏淑

本研究旨在探討譯者的操縱，關注的焦點在於譯者對文體、敘述模式、角色、情節的操縱。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此書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於1886年完成的日記體小說，1887年由哈普古德（Isabel F. Hapgood）翻譯成第一個英譯本，日譯者杉谷代水根據此英譯本，於1902年翻譯成日文的《學童日誌》，而中譯者包天笑再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這段從義大利到中國的漫長旅程是一個複雜的轉譯過程，每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凸顯出譯者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研究比較義大利文、英文、日文、中文四種語言版本，觀察譯者如何操縱文本。他們的操縱顯示出翻譯其實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的改寫。透過本研究提出的譯例，可以清楚看見譯者受到當時社會在詩學規範或道德規範方面的影響。在包天笑的譯本中，他將書中的故事改寫並在地化，類似這樣的翻譯策略在晚清頗為普遍，但透過本研究的比較與分析，可以證明包天笑的操縱也受到日譯本很大的影響，而不全然是他自己的創意發揮。在許多增刪改寫的部分，其實是日譯者杉谷代水操縱在先，包天笑只是蕭規曹隨。不過這兩位譯者的操縱都反映出他們在創新與守舊、西方與東方、異化與歸化之間矛盾掙扎，兩股力量的拉扯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由此案例觀之，譯文並非原文的反映或再現，而是原文的來世，在異地產生了新的目的與效應。

關鍵詞：馨兒就學記、包天笑、操縱、翻譯

收件：2010年1月1日；修改：2010年1月21日；接受：2010年2月1日

Translator Manipulation: From *Cuore* to *Xin's Journal about School Life*

Hung-shu Chen

This study proposes to discuss translator manipulation, especially focusing on the manipulations of genre, narration, characters, and plot. The case to be studied is *Cuore*, an Italian diary novel written by Edmondo De Amicis in 1886,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Isabel F. Hapgood in 1887. The English version wa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in 1902, whence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Xin's Journal about School Life* (馨兒就學記), was derived. The voyage from Italy to China constitutes a complicated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versions place the translator's role in the spotlight.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Italian, English, Japanese and Chinese versions, observing how these translators manipulated the texts, and infers that a translator can be a rewriter with an ideological agenda. With some interesting examples from thes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Cuor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at a translator can in all likelihood be influenced by the moral or poetic norms of his/her society. In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Cuore*, Bao Tianxiao (包天笑), the translator, localized and trans-wrote the stories. These strategies were popu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shows that Bao was influenced more by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which hi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than by his own creativity. Sugitani Daisui (杉谷代水), the Japanese translator, manipulated the stories first, and Bao was more like a follower. Both of their manipulations, however, demonstrate that they struggled between new and old, West and East,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and their struggles are very much connected with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In this case, translation is not a reflection of the original but an afterlife with new purposes and effects.

Keywords: *Cuore*, Bao Tianxiao, manipulation, translation

Received: January 1, 2010; Revised: January 21, 2010; Accepted: February 1, 2010

壹、導論

提起《愛的教育》或《萬里尋母》，許多 1970 年代在臺灣度過童年階段的人大概都會覺得耳熟能詳。前者是當時國民小學極為推薦的兒童讀物，後者則是 1977 年在華視播出的卡通節目，原名為《尋母三千里》（母をたずねて三千里），是日本動畫公司 1976 年於日本富士電視臺播出的卡通。這部卡通改編自《愛的教育》其中的一個故事，而這本書原為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的作品，書名為 *Cuore*，原意為「心」，民國之後夏丏尊譯為《愛的教育》，此後大家多以此書名稱呼這部作品。不過由於我要探討的並非夏丏尊的譯本，而是此書進入中國的第一個譯本，為了避免混為一談，因此提到原作時不以《愛的教育》稱呼之，而以原文 *Cuore* 來表示。

Cuore 其實早在 1909 年便已譯介到中國，以〈馨兒就學記〉為題刊載於《教育雜誌》，譯者是當時的通俗文學作家包天笑¹，後來此書在 1910 年出版成冊。經過他的中國化改寫，一個義大利小學生的日記，成了一個中國孩子馨兒的日記回憶²，這之間的轉變非常大。然而這些轉變是如何造成的？如果單純以為是當時翻譯觀念還不成熟，所以包天笑才會任意改寫，這樣的推想恐有過於簡化之虞，也未能將更複雜或更深層的其他因素考慮進去。由於包天笑是根據日譯本轉譯而來，因此中譯本與原文之間的差異，恐怕並非單由包天笑一人造成。根據包天笑所言：「日本人當時翻譯歐美小說，他們把書中的人名、習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變為中國化」（1990，頁 461）。可見是日譯者先採取在地化的策略，而包天笑則蕭規曹隨。因此，欲瞭解其中譯者的操縱之處，必須追本溯源，始能釐清以下幾個問題：《馨兒就學記》與 *Cuore* 之間存在哪些差異？這些差異是誰造成的？又是如何造成的？要解答這些問題，必須釐清這中間轉譯的過程，找出每個譯本所根據的源文（source text），

然後以文本分析的方式來比較其異同，再進一步分析譯者居中的操縱，並歸納這些操縱產生了什麼效應。

貳、相關研究

關於譯者包天笑，現有研究多半著重於探討其身爲通俗小說家與鴛鴦蝴蝶派的作家身分³，或者對其從事編輯活動的始末加以介紹⁴，對於其翻譯的部分則都著墨不多，即便有所提及，也多半是史料的整理，少見對其翻譯內容或策略的分析。單就《馨兒就學記》這部作品深入研究的，可能就只有張建青（2005）的碩士論文《Cuore 中國百年（1903-2004）的譯介與接受》。論文中對於包天笑在晚清時期所譯《馨兒就學記》的始末有詳細的史料呈現，列出了這本書在中國 48 種譯本的出版資料，不過這些史料可能有些部分尚有討論的空間⁵。除了討論包譯本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之外，張建青也討論夏丐尊《愛的教育》譯本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整體而言，他的論文主要還是歷史資料的呈現，對於文本內容或翻譯策略並沒有多加分析。後來他將碩士論文濃縮簡述，列爲博士論文《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的第二章第三節，但未見新的資料或更正。

從真實文本來探討包天笑的翻譯作品與其翻譯策略的研究，大概就只有吳其堯的〈包天笑在清末民初的翻譯及其與創作的互動關係〉。吳其堯針對包天笑翻譯活動的探討提出了幾個重點。他認爲包天笑對「社會」題材的熱衷無可避免的滲透到他的翻譯活動中，從其翻譯的選材上來看，包天笑偏向選擇展現社會現實的作品，或以介紹他國國情爲目的，或作影射本國之用。其次，他也喜歡在譯文的字裡行間夾雜對時事政治的評論以及對人情世故的描寫，使其翻譯的意圖更加鮮明（2003，頁 16）。此外，由於包天笑作家與譯者的身分同時並存，因此他的作家性格影響了他的翻譯實踐，作家式的社會關懷促使他選擇了類似主題的外國作品，而在

翻譯之際，他又很難排除自身的寫作傾向，所以很難遵守原作的風格或再現原作的精神（頁 17-18）。不過吳其堯對於包天笑的社會小說著墨較多，對於教育小說亦只是史實敘述，而其有關包天笑的作家性格影響其翻譯實踐的這個論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包天笑是先開始翻譯，然後才嘗試創作。因此，或許不能只說是他的創作影響了他的翻譯，而忽略了另一個層面：他的翻譯亦可能影響了他的創作。

簡言之，目前對於包天笑的研究少見研究其翻譯活動，其中針對教育小說的翻譯探討亦不多見⁶，且這些研究大多是史料的呈現，未能有系統的從真實文本中來觀察包天笑的翻譯。我將深入探討《馨兒就學記》從義大利到中國這段旅程所經歷的轉變，藉由譯本比較分析，觀察轉譯的過程中各個語文的譯本呈現怎樣的變化與操縱，並延伸探討這些操縱背後可能的原因，包括譯者個人因素與社會文化因素等等。

參、轉譯始末與譯者背景

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自承《馨兒就學記》譯自日譯本⁷，但過去的研究始終無人能確定此日譯本確切的出版資料，包天笑本人在序言、後記、回憶錄中也未曾提及。神田一三（無日期）曾經根據發行年的資料，推測杉谷代水譯的《學童日誌》可能是包天笑《馨兒就學記》所根據的源文，不過神田也明言無法確認。經過我查證出版資料，發現在〈馨兒就學記〉開始連載的 1909 年之前，*Cuore* 在日本只有 1902 年《學童日誌》這個日譯本，再經過詳細的文本比對，我幾乎可以斷定：《學童日誌》就是《馨兒就學記》的源文。

根據杉谷代水的語文背景及書中緒言，我進一步推論《學童日誌》亦非直接譯自義大利原作，而是轉譯自英譯本。再追本溯源，我找出《學童日誌》出版年之前的英譯本，同樣經過文本分析比對，可確定《學童日誌》譯自美國的第一個英譯本，書名為《心：一個義大利男學童的日

記》(*Cuore: An Italian Schoolboy's Journal*)，譯者為哈普古德 (Isabel Florence Hapgood)，此譯本是根據義大利原作第三十九版所譯。因此，簡而言之，*Cuore* 是先由哈普古德於 1887 年翻譯成第一個英譯本，然後杉谷代水於 1902 年根據此譯本翻譯成第一個日譯本《學童日誌》，接著才是包天笑根據此日譯本翻譯成第一個中譯本《馨兒就學記》。

在分析文本之前，先瞭解三個譯本及譯者的背景資料，有助於我們把研究與分析放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脈絡下來檢視。據包天笑自述，他的翻譯活動是從與楊紫麟合譯的《迦因小傳》開始，之後不久他又譯了兩本日文書，一本是《三千里尋親記》，另一本是《鐵世界》，這兩本書的原文都是他留學日本的朋友回中國時帶來送他的（包天笑，1990，頁 202-208）。包天笑所言之《三千里尋親記》，其實是譯自 *Cuore* 書中最長的一篇每月故事。若由此推論，當時友人送給包天笑的書應該就是杉谷代水所譯的《學童日誌》。

郭延禮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書中提到包天笑在《鈞影樓回憶錄》的這段自述，後來他又提到包天笑在 1905 年出版了《兒童修身之感情》，此處可看出郭延禮並不知道《兒童修身之感情》講的就是《三千里尋親記》的故事，他只在該頁註腳說明：「《三千里尋親記》，據包天笑自己說，書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但因找不到原著，無法評論。查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和樽本照雄等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均未登錄。」（2005，頁 342）。無獨有偶，張建青列出的 *Cuore* 百年譯介簡表中，也沒有列入《兒童修身之感情》（2008，頁 177-192）。可見郭張二人並沒有審視文本，所以不知道《兒童修身之感情》是取自 *Cuore* 的故事，也不知此書便是《三千里尋親記》。

在找不到真正的書本實體及確切出版資料的情況下，歷史上究竟有沒有《三千里尋親記》這本書，恐怕已經成爲一個問題。神田一三（無日期）便認爲根本就沒有《三千里尋親記》這本書的存在，是包天笑在執筆回憶錄時把書名說錯了。我認爲此推論十分合理，因爲包天笑記憶

有誤已非罕事，在《釧影樓回憶錄》中尚有其他例子，例如他記錯了教育「三記」⁸的出版順序，又將《埋石棄石記》寫成《棄石埋石記》⁹，另外他還將周瘦鵑的《九華帳裡》記成了《芙蓉帳裡》（沈慶會，2005，頁101）。包天笑撰著《釧影樓回憶錄》已經七十四歲（柯榮欣，1990，頁1），此時或許他早已忘記書名，只記得是一個小孩子到三千里外尋母的故事，於是才會把書名說成《三千里尋親記》。更何況除了包天笑自己提過這個書名之外，始終未曾有人查到這本書的出版資料，阿英與樽本照雄的目錄也都不曾記載。因此《三千里尋親記》可能根本不會存在過，而是一出版便以《兒童修身之感情》的書名問世。

且不管真相如何，可以確定的是，*Cuore* 的譯介至少始於《兒童修身之感情》，他將書中最長的一篇每月故事翻譯成這本書，以單行本形式交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到了1909年，他又將 *Cuore* 其餘篇章連載於《教育雜誌》，1910年再以單行本形式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名為《馨兒就學記》。

杉谷代水（1874-1915）是第一個把 *Cuore* 譯介到日本的譯者，他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的前身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曾經協助坪內逍遙編輯國小的國語讀本，也曾與方賀矢一共同完成《書翰文講話及文範》。此外，他也編寫歌詞和劇本，寫過《熊野》、《大極殿》、《希臘神話》等劇本，而他作詞的「星の界」（星的世界）是編入日本小學教科書的名曲。他翻譯的《學童日誌》於1902年12月由春陽堂出版，校閱者為日本寫實主義先驅坪內逍遙。此書分成上下二卷，菊判紙裝，共329頁，另外還附有插圖（楠山正雄，1902/1938，頁2）。杉谷代水在譯者序中解釋了自己的翻譯策略，他提到書中的國情、風俗、宗教、歷史、社會學制與日本相異，所以他會大筆修改、增添、削減。另外原作中主角的父母和姊姊會寫信給主角，給予批評訓誨，但因為書信體在日本並不常見，而信中的批評訓誨也不過是綜合各事件的思考心得，因此他便予以省略。此外，原作者的倫理思想若與杉谷所見相異，或有容易令日本讀者誤解之處，杉谷也會

在權衡之後決定取捨。杉谷的翻譯策略反映出日本明治時期大量翻譯西方著作的傾向與作法，這一點與中國清末民初的社會背景雷同，其歸化的翻譯策略也相似。

相較之下，英文譯者哈普古德的翻譯策略便要忠實許多，誠如 1895 年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 的書評所言：「譯者完整保留了原著的精神。」(1895)。哈普古德花了十年學習日耳曼語系與拉丁語系的語言，然後在 1886 年才開始從事翻譯與評論等工作 (*Free Dictionary*, n.d.)。她翻譯 *Cuore* 的時候是 1887 年，可見此時的她才剛開始嘗試翻譯。她後來翻譯了東正教的禮文書 (*Service Book*)，也翻譯了許多俄國作品。另外她也翻譯了雨果 (Victor Hugo) 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和《鐘樓怪人》(*Notre Dame De Paris*)。從這些翻譯作品可看出她翻譯語文的多樣性，無論是俄文、法文、義大利文，似乎都難不倒她。然而有關她的翻譯策略，目前我尚未找到任何評論或是其本人的自述，但從其英譯本與義大利原文的比較可以發現，哈普古德幾乎是亦步亦趨跟著義大利原文的腳步，有時連用詞句型都一模一樣，可說是十分忠實的譯者。

至此 *Cuore* 從義大利到中國的翻譯脈絡已大致清楚，此書經過了層層轉譯，跨越了三種語言，形成第一個中譯本呈現在中國讀者眼前的面貌，此面貌與亞米契斯的義大利原作已經差之千里，然而這中間的差異，涉及三位譯者與三種語言文化。以下我再從文體、敘述模式、情節、角色四個面向來瞭解此書轉譯過程中的轉變，並探討這些轉變與譯者操縱之間的關係。

肆、文體的操縱

晚清時期豐富的西方小說翻譯至中國，不僅將小說從原本文學系統中的邊緣位置移至中心位置，也引進了許多中國文學過去沒有的文體，「教育小說」便名列其中，而《馨兒就學記》便經常被歸類在教育小說的

類別之下。這樣的歸類，是根據其題材內容（即內在形式）來區分。若從形式結構（即外在形式）來檢視，則可看出此作品主要以「日記體」來呈現。值得注意的是，義大利原作中出現的「書信體」，在杉谷代水的《學童日誌》中被刪除了，因而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也就沒有出現這種文體。這部作品從義大利文輾轉譯成中文之後，教育小說的文體定義發生了變化，日記體變成回憶錄，而書信體則遭到刪除。

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又譯為成長小說或性格發展小說，始於十八世紀中葉，主要敘述一個人的發展及成長過程，經常描寫主要人物性格形成時期的生活，並描寫其道德倫理與心理方面的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大英簡明百科，無日期）。巴赫金（M. M. Bakhtin）認為「人的成長」是使教育小說有別於其他小說的特點（白春仁、曉河譯，1998，頁 229），以這樣的觀點來看 *Cuore*，會發現這部作品與教育小說的精神其實有所差異，因為 *Cuore* 的重點似乎不在於主角的性格發展，而在於透過主角的眼睛所觀察的生活點滴。此外，莫瑞提（Franco Moretti）認為教育小說是「現代性」的象徵形式（Moretti, 1987, p. 5），而廖咸浩則認為成長小說是對現代性的一種體現，都是對成人世界（「它們世界」、「常識世界」等體制化、規格化思維）的反抗，是對少數的肯定（1996，頁 87-88）。然而這種對抗主流體制的精神在 *Cuore* 裡卻看不到，讀者看到的是書中人物對國族社會的熱愛，對父母師長的服從。由此來看，*Cuore* 是否應歸類於「教育小說」，似乎頗有討論的空間。

如果說 *Cuore* 內容主題不是主角的性格成長發展，亦無反映出成長小說中常見對既有體制的反叛，那麼何以《馨兒就學記》總是被稱為「教育小說」呢？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顧名思義或望文生義的結果，大家以為舉凡與教育或學校生活相關的小說，便可歸類為教育小說。郭延禮談到中國教育小說的初端，便認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新式教育的誕生刺激了外國教育小說的翻譯，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馨兒就學記》（2004）。這樣

的說法顯然將教育小說和新式教育的興起串聯在一起。

由於《馨兒就學記》一開始是在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誌》連載，該雜誌宗旨在於譯介和傳播西方和日本先進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及教學方法。在這樣的教育刊物連載，加上內容描寫環繞著學校生活，出書之後又獲頒教育部獎狀，書中「掃墓」的一節文字更入選民初商務版的高小國文課本，整個外在環境的氛圍，都讓人覺得將其稱為「教育小說」恰如其分。包天笑本人更狹義的認為只有《馨兒就學記》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教育小說（包天笑，1990，頁 387），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小說」，乃是以《馨兒就學記》等圍繞於學校生活的篇什為主，而《苦兒流浪記》之類的小說，其實只是「兒童小說」，不能算是教育小說（梅家玲，2006，頁 166）。

將《馨兒就學記》歸類為教育小說的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著眼於作品傳達的教育意義。綜觀全書，從校長的每月故事以及學校發生的種種事件，無不是意圖於教育少年愛國愛民、敬愛長輩、團結友愛等情操，對於父子、師生、朋友之間要如何待人接物，都做了詳細的描述與示範，儘管沒有忠孝節義的教條訓示，但是講述各個少年的義行，目的也是為了說服與教化大眾。這點與當時梁啟超呼籲以小說教化大眾、教育童蒙頗能相互呼應。於是，不具「個人成長」特色的 *Cuore* 譯介到了中國，因為與「教育」二字密切相關，加上內容又充滿教育意義，使得「教育小說」這樣的歸類順理成章。然而，這樣定義下的教育小說，與西方文學所定義的教育小說，其實是不同的內涵。換句話說，晚清至民國時期日本人與中國人談的教育小說根本不是我們現代所談的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兩者不該混為一談。避免混淆的方式有兩種，一種就是不要再把 Bildungsroman 翻譯成「教育小說」，而應翻譯為「成長小說」，以免與《馨兒就學記》這類具有教化作用的小說混淆；另一種方式則是將《馨兒就學記》這類小說定義為「教化小說」，以便與具有成長、反叛因素的「教育小說」有所區隔。

日記體亦是這部作品的文體特色。馬汀斯（Lorna Martens）將日記體小說（diary novel）定義為「一種虛構的散文敘事體，由單一的敘事者以第一人稱日復一日所寫下，文中沒有任何虛構的受話者存在。」（Martens, 1985, p. 4）作家選擇利用日記體裁創作，其意圖在於表現真實性。藉著賦予作品紀錄的型態以證實故事內容是在現實中發生的。此外，紀錄具有連貫性的日期，這樣一種偏執性質的作業顯示出記載者是規矩認真且值得信賴的觀察者（林欣儀譯，2002，頁 262）。

亞米契斯在原作序言中強調此書以真實日記為主，經過敘事者依照回憶添補修改，也經過敘事者父親的重新編輯，這種真實性是義大利原作的特色之一，這個特色在英譯本與日譯本都保留了下來，到了《馨兒就學記》卻失去了。包天笑在書中第一章便寫道：「余他不復記，記我丙寅之秋，至來年瓜期之情事。此一年中，余略能記憶，乃以日記體誌之。惜余不文，顧亦願我可愛之少年，課暇時輒流覽焉。」（1976，頁 1）這段文字點出兩個重點。首先，敘事者雖然「以日記體誌之」，但嚴格說來，此書並不算真正的日記體，感覺起來更像是回憶錄，因為寫作的時間點並不是故事發生的時期，而是敘事者兩鬢霜白之時，這種回憶童年時光而寫下的作品，儘管標上日期，卻與真正的日記體並不相同。其次，文中明白指出其預期的讀者是「可愛之少年」，表示敘事者在寫作之時，便懷著被閱讀的期待，這樣的期待與馬汀斯所定義的「文中沒有任何虛構的受話者存在」是有所衝突的。顯示其真實性已大不如原作，其所謂的「日記體」與原作的日記體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原著的另一項文體特色是書信體。書信體與日記體類似，同樣是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表露內心情感的體裁。在亞米契斯的原作中，主角的父親、母親、姐姐經常透過書信對他抒發內心感受並且諄諄教誨。全書一共有十七篇書信，其中大部分為主角父親所寫，五篇是母親所寫，一篇是姐姐所寫。這些書信的存在，可以對於同一事件提供有別於主角第一人稱的詮釋觀點。換句話說，讀者可以同時從主角及其家人不同的觀

點來建構小說的情節。既然日記體的第一人稱「我」無法呈現全知全能觀點，因為所知有限，所以多三個不同人物的「我」來補充單一觀點，有助於展現情節的多種面向。

這樣多重觀點的敘事體裁，到了《學童日誌》卻全然消失了。杉谷代水刪去了所有書信，父親、母親、姐姐的聲音無法參與共同建構情節的過程，讓這本多重聲音的作品，簡化成單一敘事者的聲音，也阻斷了讀者從別的觀點來看事件的可能。讀者除了聽到主角自我檢討的心靈對話之外，無法從其他觀點來檢視主角的自我檢討，主角的第一人稱敘事成了唯一的權威。除了敘事觀點變得侷限之外，缺少書信體的《學童日誌》也無法進一步處理主角與家人之間的關係。讀者只能從主角的單一觀點來觀察其家人的行爲，或從他們之間的對話來推測這些家人的個性，而無法深入這些次要角色的內心世界，使得整本作品想傳達的主題變得比原作薄弱。

此外，原作中這些書信同時提供了客觀與主觀雙重觀點，對於主角性格能有側面的描寫與認識。沒有家人書信中提出的勸誡之言，讀者無法得知主角其實也有做錯事的時候，也有性格軟弱的時刻。有時也會對母親說出失禮的話，有時看到路邊瘦小的乞丐孩童會視而不見，有時會在背後批評老師態度不好，有時會走路冒冒失失碰撞到無辜的路人，有時會因為遭父親責罵而遷怒到姐姐身上。這種種過失或不良行爲，在《學童日誌》的主角身上都看不到，讀者很容易將主角看成一個理想的兒童典範。在角色的塑造上，這樣的角色趨於扁平化，無法呈現較豐富的層次。簡言之，刪去原作中家人寫給主角的書信，也就同時刪去了其他次要角色的聲音，除了主角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之外，讀者無法接觸其他詮釋觀點，對於主角的性格，也無法有更豐富的觀察角度。另外，主角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因為少了這些書信而欠缺更深度的描寫，使得本書的主題變得較為侷限。

刪除書信體是杉谷代水做的決定，不過在簡化的傾向方面，包天笑

倒是與杉谷代水有志一同。整體來說，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也將作者的聲音減到最少。書名上寫的是「天笑生著」而非「天笑生譯」。在這樣宣示主權的動作下，原作者亞米契斯的聲音立刻遭到消滅。再加上原本杉谷代水就刪除了所有的書信，使得這位年長的敘事者成為唯一的第一人稱權威，讀者只能透過他的描述來建構情節，這種「限制的視域也給小說的自由表現帶來困難」（陳平原，2006，頁95）。

《馨兒就學記》除了大幅中國化改寫之外，文體也產生了變化。就內容題材而言，原本「教育小說」的定義被包天笑簡化為與「學校教育」相關的小說。就形式體裁而言，原本的日記體，經過包天笑改為敘事者年老之際回憶童年的紀錄，雖然註明日期，但卻喪失了日記體原有的立即性與真實性。原作的書信體，因為杉谷代水的全數刪去，而使《學童日誌》與《馨兒就學記》無法提供讀者多重觀點，亦無法擴大探究主角與家人的關係。這些文體上的簡化與保守作法，未能使日記體、書信體這樣的西方新文體在中國發揚光大，而要等到五四時期，日記體、書信體、第一人稱敘事、自由間接引語等寫法，才開始引起許多作家注意而大為風行。

伍、敘述模式的操縱

從形式來看，除了文體的轉變之外，譯者也操縱了這部作品的敘述模式。以下我將以單位大小為劃分標準，從篇章、段落、詞句三個面向來探討敘述模式的變化。整體來看，英譯本比較忠於義大利原作，日譯本改動頗多，而中譯本則是改變最多，因此本章主要還是在觀察並分析日譯本與中譯本的轉變。

日譯本的篇章改動主要原因可能是文化差異，例如義大利原作提到的萬靈節，這是日本沒有的節日，因此在杉谷代水決定將譯文日本化之後，這些與日本相異的風俗只得刪除。因為書中的人物、習俗、文化都已經日本化了，所以日本沒有的節日，自然沒辦法放在日本化的脈絡下來描

寫。然而中譯本的篇章改動恐怕因素更複雜一點，包天笑增加的掃墓情節具有提倡舊道德的濃厚意味，而增加的「雛形國會」這一篇則反映出效法西方議會制度的強烈動機。既想引進新思維，又想保留舊道德，可看出晚清文人夾雜在新舊文化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此外，中國與日本的政治立場衝突，也迫使包天笑遇到日譯本提到的「日清戰爭」情節，都必須改為與其他國家的戰役，甚至整篇刪除，因為中國讀者無法接受日譯本對支那人的負面描述。

再看段落的操縱。*Cuore* 的內容主要由主角日記、每月故事，以及家人書信所構成。三種形式彼此交錯夾雜出現，其轉換考驗著讀者的思緒跳躍能力。在原作中，這三者的轉接經常是直接插入而沒有引語，這種截斷式的效果頗富新意。然而日譯本與中譯本似乎不能接受這種效果，因此總是會加入一些引導的話語。在原著 *Cuore* 共有九次敘事中插入故事，只有第一次時老師簡單說明今後每月都會講一個高尚少年的故事，之後每次都直接開始插入故事，完全沒有轉接的段落。哈普古德的做法與原著相同，杉谷代水則是在第一次的前言說明較多，不過後來的每月故事也都是直接開始進入故事內容。但是包天笑在每月故事之前總是會加上一段引導式的前言。這種作法也許是想避免時空轉換的突兀之感，希望能承接時間順序，順利的將讀者的思緒拉到故事裡，但原作想嘗試的雙重敘述模式或許是亞米契斯想刻意製造的效果，在《馨兒就學記》中，這種效果卻無法彰顯出來。

此外，日譯本與中譯本都有把間接敘述轉變為對話的傾向。一段敘述變成了對話之後，可能產生更生動的效果，讓讀者感覺到歷歷在目。以日譯者杉谷代水的背景來看，由於他也從事編劇工作，因此將描述變成對話可能與他編劇的傾向十分相關。而包天笑將描述變成對話很可能是為了強調，藉由對話的修辭效果把他想要教育的話語或呈現的意識形態生動的傳達出來。例如有一次主角之妹生病（原文為主角之弟），其師造訪探視，談及一名學生之母為表感謝老師之意，以報紙包石炭做為禮物

送給老師。原文中只以間接描述的方式來表現，但日譯本卻以對話方式，加重描述了這一段，同時也描述老師與主角及其家人對此行爲感到可笑。

義大利文：

Il figliuolo del carbonaio fu scolaro della maestra Delcati, che è venuta oggi a trovare mio fratello malaticcio, e ci ha fatto ridere a raccontarci che la mamma di quel ragazzo, due anni fa, le portò a casa una grande grembialata di carbone, per ringraziarla che aveva dato la medaglia al figliuolo; e s'ostinava, povera donna, non voleva riportarsi il carbone a casa, e piangeva quasi, quando dovette tornarsene col grembiale pieno. (De Amicis, 1908/2006, p. 28)

英文：

The son of the charcoal-man had been a pupil of that schoolmistress Delcati who had come to see my brother when he was ill, and who had made us laugh by telling us how, two years ago, the mother of this boy had brought to her house a big apronful of charcoal, out of gratitude for her having given the medal to her son; and the poor woman had persisted, and had not been willing to carry the coal home again, and had wept when she was obliged to go away with her apron quite full. (De Amicis, 1895, p. 28)

日文：

僕の級にゐる炭屋の息子の江崎は、尋常科のとき、藤井といふ女先生の受持であつた。今日、藤井先生は僕の弟の病氣見舞に來て、その時分の話をして、母や弟を笑はせられた。江崎が尋常二年の時、試験がよく出來て、褒美を貰つたことがあるさうな。すると、江崎のお母さんは、藤井先生の家へ來て、色々と禮を述べ、「これはお粗末ですが」と新聞紙に包んだ大きなものを差出したから、見ると、商賣もの、堅炭一束。噴き出すほど可笑しくもあり且つは氣の毒で、それとはなし

に押し返すと、「まあ、左様おつしやらずと、どうぞ、是は、私の志ですから」と、強ひて置かうとするゆゑ、「いえ、學校の教師は物を貰つてはならぬ規則ですから」と、無理に持たせて返すと、「へえ、それでは御規則ですかえ、存じませんでした、まあ、御窮屈なことですなえ。」としみしみさう言つて歸つたさうだ。(杉谷代水譯，1938，頁57-58)

中文：

初六日，今日我妹病矣，蔣韞珠女先生，愛我妹尤甚，課暇時，乃來視吾女弟疾，以談及江生事，吾母與妹咸大笑，蓋今與我同級之江生，即其父設炭肆者，去歲尋常科受業於蔣先生者也。蔣先生謂江生頗聰慧，每逢試驗，不落人後，先生恒褒美之。一日，江生之母，詣蔣先生家，致感謝之意，忽出一巨裹，以新聞紙包之，曰：「略具粗物敬奉先生。」蔣先生啟而視之，則裹一堅硬之石炭，蓋肆中商賣品也。蔣先生笑聲衝喉而出，顧亦未嘗不心感其誠，乃曰：「謹謝盛惠，心領之矣。」江生之母曰：「是區區者，烏足以褻先生，惟聊盡我心，萬望哂納，先生苟卻我者，我乃窘矣。」蔣先生曰：「非我卻君之惠，吾學堂中規則如是，教習固不當受學生私饋也，故惟有心領盛意而已。」江生之母曰：「如先生言，我不能強力破此學校之規則。」於是乃挾此巨炭歸。(包天笑，1976，頁114-115)

從以上四種版本的比較，可看出原作與英譯本都是間接描述，而日譯本與中譯本卻把這個段落加入了對話，使得整個場景變得歷歷在目。把間接敘述翻譯成直接敘述，看似情節並無改變，但是從修辭的角度來看，後者的生動性似乎加強了這一段的戲劇效果。這種語言的操作其實也是譯者意識形態操縱的場所。換句話說，在與原文相同情節的部分，譯者以自己的話語描述，其選擇生動描述或輕描淡寫，亦反映出譯者的意識形態。

最後再看詞句的操縱。以日譯者與中譯者的歸化譯法來看，照理來

說，應當每個詞句都會譯成本國語。然而在日譯本中可以發現有些字詞以音譯的方式來處理，這或許也與現在日文當中有許多外來語的原因相關。這樣的操縱可能是明治時期的風氣所促成，因為在明治維新之後，從歐洲語文進入日文的外來語大量增加。在杉谷代水的譯本中，可以看見英文的 lamp 就直接音譯為ランプ（1938，頁 38），甚至有時寫的雖是漢字，但旁邊標示的讀音卻是英文外來語的發音。另外有一篇他為了強調說話的是外國人，也把 take this too 直接音譯為テーク・ジス・ツー（1938，頁 25）。

而包天笑的中譯本則可看出挪用日文漢字的情況。許多意思相近可直接以中文理解的語詞，包天笑便直接挪用漢字。甚至連人名地名也直接挪用，若不挪用他也會選擇類似的字。這種挪用可能是因為日文與中文的相似性，對日文程度有限的包天笑而言，直接挪用可說是最方便簡單的翻譯法。尤其是書中的專有名詞便是很好的例證，書中有完全相同的人名與機構名，例如：「義郎」、「明德小學校」、「慈惠」醫院；另外有許多人名的相似度也頗高，例如「近藤」譯為「滕家望」，「吳」譯為「小吳」，「高村」譯為「高景明」，「蘆澤」譯為「盧」生，「留吉」譯為「安吉」，「藤山」譯為「葉山」，「島田」譯為「田振實」，「源」譯為「周源」，「峯」譯為「陳翠峯」。從這些相似的例子可以看出包天笑只取日文人名的一個漢字，然後再加上一字或兩字，使人名變得中國化。

然而挪用漢字可能產生的危險就是「偽友」（false friend）的問題，包天笑在挪用漢字時，便出現這種直接挪用而造成意思不同的結果。例如在日譯本中，有一次主角遠藤的同學到家中玩耍，要離開的時候，遠藤的母親一邊說話，一邊拿了些東西送給遠藤的同學長谷部：「と云ひながら、又菓子の包を長谷部に與へた。」（杉谷代水譯，1938，頁 118）。在日文中的「菓子」指的是餅乾糖果之類的零食點心，又可分為和菓子和洋菓子。包天笑在此處的翻譯是：「吾母復以果子作巨裹，與張公霖，……」（包天笑，1976，頁 227）。中文的「果子」指的則是水果之類的可食用果

實，與日文的菓子實非同物，這便是挪用漢字卻造成誤譯的結果。

在晚清許多從事翻譯的文人志士當中，直接挪用日文漢字的人其實不乏多見。因此，就如同外來語對日文的影響一樣，從日文譯入中文的漢字，也大大影響了現代中文的面貌。我們現在所說的中文，有許多都是藉由晚清文人的譯介而帶進中國的日本語詞。劉禾（宋偉杰等譯，2002）在《跨語際實踐》書中的附錄便羅列了許多這樣的語詞。綜上所述，無論是篇章、段落、詞句的操縱，可以發現譯者的操縱並非任意為之，主要還是受到本國文化的詩學與意識形態的影響。

陸、角色的操縱

除了形式方面的操縱，譯者在內容上的操縱也是明顯可見。接下來我將分別關注於角色與情節的操縱。首先來看譯者如何塑造主角安利可（Enrico）。安利可是一個出身中產階級家庭的三年級學童，他的同學則多半家庭貧苦清寒，有些甚至個性古怪或身體殘缺不全，不過安利可始終很願意與同學結為好友。儘管如此，安利可還是會有一些個性上的缺點，這些偶爾發生的不良表現，在父母及姐姐寫給他的書信中一覽無遺。但是杉谷代水將書信體刪除之後，主角的性格便少了這些缺點，而顯得沒有瑕疵。到了包天笑筆下甚至還發揚光大，將他塑造成一位模範兒童，不但富有愛心且熱心助人¹⁰，而且經常想著要如何孝順父母報效國家¹¹，絲毫沒有一點偷懶或壞脾氣的缺點。

這種模範化的傾向也擴及其他好人角色，為了塑造這些角色在艱苦中依然堅強的品格，包天笑有將角色悲情化的傾向，也就是令角色的身世更可憐，或是遭遇更悲慘，希望更能激發讀者的情感。在悲慘遭遇的映襯下，好人角色益發神聖化。例如主角有一位同學家裡是賣薪柴的，在原作、英譯本、日譯本當中，他的父親外出，所以他在家幫忙，工作的時候剛好主角來訪。然而到了包天笑筆下，這位同學的父親卻已經為國捐

軀，留下寡母幼子。這樣的改寫讓這位同學的孝行似乎更令人敬佩。原作中這位同學的父親確實參加過戰役，並且得到一枚勳章，到了日譯本，改成得到三枚勳章；到了《馨兒就學記》，則詳加敘述其父愛國參戰之舉，而且強調其獲得的勳章纍纍不可計數（包天笑，1976，頁 77）。

除了好人變得更好之外，包天笑筆下的壞人形象更爲鮮明。配合晚清時期的政治氣氛，最適合擔任壞人的角色就是欺壓中國的西方列強。此外，包天笑或許欲藉此激發讀者同仇敵愾的心情，藉由強化外國人欺壓中國人的印象，鼓勵當時的讀者能夠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爲了激發讀者之愛國情操，包天笑字裡行間刻意加強對外國人的醜化與敵意。例如第一次校長講話會所說「愛國少年」故事裡，欺凌少年主角的壞人在日譯本裡並沒有特別說明國籍，而包天笑卻強調是美國人，並說：「…此號稱文明之美國人，眼中祇有金錢，別無義理…嗟夫！彼美國人者，以爲支那人可欺耳！謂余不信，請觀數年前之美禁華工案¹²。」（包天笑，1976，頁 45）。壞人被歐美化的傾向，在包天笑的譯本中明顯可見。無獨有偶的是，由於日清戰爭的關係，杉谷代水則會把支那人設定爲日譯本故事裡的壞人，是造成日本英勇少年喪命沙場的敵人。

包天笑把角色用二分法的方式區隔開來，好人就彷彿聖人一般，壞人則都是外國人，這樣刻板的二分法其實讓角色變得扁平化而缺乏豐富性。這種漢賊不兩立的態度比較接近中國傳統小說，而在壞人角色的塑造上，則可看到當時的政治情勢對譯者在塑造角色時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包天笑或許承襲了日譯本將壞人貼上國籍標籤的做法，不過遇到壞人是支那人的情況，他就會把角色的國籍從支那人改爲歐洲人或美國人。

柒、情節的操縱

義大利的小說轉譯到日本，接受了杉谷代水的日本化；再轉譯到中國，又遭到包天笑的中國化。這種把異國故事放到本國情境下的譯法，我

稱之為「在地化」，以避免與更廣義的「歸化」混淆，因為後者還包括了文字上的歸化。以中國的情況來看，在包天笑之前便已有嚴復、林紓等譯家開始譯介西方作品，他們雖然在寫作的方式上採用歸化的譯法，但是書中所描述的皆是外國的人物與社會情事。包天笑的中國化譯法顯然受到日譯本的影響很大。他明知此書原作是歐美小說，經由日譯者把故事給日本化了，面對著一個已經不是忠實的源文，自然覺得自己無忠實之必要，更何況當時「譯寫不分」的風氣也讓他對情節的操縱更覺自由。

中國當時「譯寫不分」成為普遍的現象，許多翻譯作品可能根本不提原書名，目的就是要讓讀者以為這本書是創作，所以書的內容也不會出現破綻，以免讓讀者意識到這是翻譯作品。更何況這本書的翻譯主要是由於教育雜誌向包天笑邀稿，要請他寫一些教育小說來連載，因此包天笑既然決定以作者之姿來寫教育小說，也就順理成章的把書中的一切視為創作，而故事背景也就設定在當時的中國。

不過決定採用在地化的譯法之後，譯者並不是只有把人名、地名、事物在地化就足以應付，而是必須注意到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例如原作有一篇故事提到有一艘「法國」輪船從「巴塞隆納」開往「義大利的熱那亞」，杉谷代水譯成一艘「日本」輪船從「北米合眾國的桑港」（美國舊金山）要歸航「日本」，而包天笑則譯成一艘「中國」輪船從「北美合眾國桑弗倫西司哥」要歸航上海。問題是，當時中國並沒有輪船行駛於歐美，所以包天笑就必須為這個在地化的動作加上一段解釋：「嗚呼，諸君乎，在數年前我中國安得有航行歐美之船？自去歲始，乃有粵紳某與旅美華僑創此公司」（1976，頁44）。所以包天笑的在地化促使他在許多細節部分必須改動，才能符合中國的背景現況。

此外，由於日譯者和中譯者刪去了某些篇章，為了情節的連貫，譯者也必須更改部分情節，以免出現前後不一致。例如有一次主角安利可上學遇到以前二年級的老師，老師問他何時會在家，希望找一天到他家裡拜訪，因為這樣的逗留，所以安利可遲到了。之後有一篇日記便是描述

這位二年級老師到安利可家拜訪的經過，然而這篇日記在日譯本中被刪除了。如果日譯本中沒有這篇，那麼前面遇到二年級老師的情節可能就必須改動，因為這位老師明明表示過幾天會去安利可家拜訪，結果後面卻沒出現這樣的情節，難免會有前後不一之感。於是杉谷代水便將這一段情節改爲主角遠藤上學途中遇到叔父，因為逗留而交談了一會兒，故稍微遲到。由此可知，因爲在地化或刪除篇章，相關情節也必須跟著改動，所以節譯或改譯其實並不見得比忠實翻譯來得輕鬆隨意，反倒有不同於忠實翻譯的問題要面對並處理。

包天笑另外也有增添情節的部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破難船」的故事。故事中有船難發生，就要沉船之際，少年周源原可跳入救生舢板的最後一個位置，但憶及前一日少女翠峰爲他裹紮傷口之恩，又念及少女之父母殷殷盼望，於是放棄活命的機會，抱起翠峰投向舢板。此故事情節與原文大致相同，但結局卻比原文多了一段插曲：「厥後，翠峰達父母許，父母欲爲之聯姻，翠峰矢志不嫁，曰：『以我餘生，奉父母以終，外此光陰，則長齋繡佛而已。』」（包天笑，1976，頁 171）此增添之結局強調少女終身不嫁，似乎要以此報答少年救命之恩。背後傳達的意涵是：女子爲報答男子相救之恩，所以應以身相許，因少年已不在人世，故應從一而終，雖然兩人並無婚約，亦無論及感情，但女子仍應以類似守寡的方式表現其忠誠守貞之美德，侍奉父母以終。此增添之情節與掃墓情節實出於同樣的舊道德情懷，也再度反映出包天笑在追求新思想之餘，始終不忘舊道德，尤其重視傳統女性的美德。

最後再談情節的改編。原作中的每月故事都是英勇少年的事蹟，這些故事無非是爲了激發少年讀者「有爲者亦若是」的情操。說故事的人在原作與英譯本中是安利可班上的導師，但在日譯本與中譯本裡，說故事的人變成了校長，地點也從教室改成了講堂。說話的對象範圍變得更多更廣，從一個班級變成了全校。將演講者與演講地點的層級拉高，將過程更加儀式化，無非是爲了增強說服之效。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將

演說依聽眾及目的之不同分成三種，分別是法庭演說、政治演說、典禮演說。政治演說用於勸說和勸阻，訴訟演說用於控告或答辯，典禮演說用於稱讚或譴責（羅念生譯，1996，頁30）。日譯本與中譯本的每月故事就是一種典禮演說。將教室裡的導師演說擴大為講堂裡的校長演說，使得說服的力量無形中也擴大了。

綜上所述，可看出在情節的操縱上，日譯本與中譯本都採取在地化的做法，不過在地化必須考慮到是否符合國情現況，如果不符則需要加以解釋或改寫。此外，為了保持情節一貫，或是為了傳達道德之說，或是為了增強說服之效，這兩個譯本也都出現情節刪除、增添、改編的情況。

捌、結語

英譯本、日譯本、中譯本三者有一脈相傳的精神，也有各自表述的差異，從這些差異當中，可以清楚看見譯者的介入與操縱，也可看出整個譯本的大致特色。基本上英譯者哈普古德是非常忠實的譯者，整本書的翻譯幾乎是亦步亦趨跟著原文。而日譯者杉谷代水與中譯者包天笑都出現了刪減、增添、改寫的情況，其原因可能是受到當時的翻譯風氣影響所致。大幅改寫增刪情節的歸化譯法是清末時期翻譯文學的一大特點，也是日本明治時期盛行的「翻案」譯法。所謂翻案，指的是翻譯加上改寫，與許多中國學者所稱的「豪傑譯」其實是異曲同工。*Cuore* 在日本接受了杉谷代水的日本化，轉譯到中國再被包天笑中國化。這種「在地化」譯法在日本明治時期相當流行，進而影響到晚清的小說翻譯。

包天笑並不是中國第一個採取「在地化」策略的譯者，梁啟超所譯的《十五小豪傑》也是一例。梁啟超在譯後語中便提到日譯者森田思軒將此書日本化，而他自己又將其中國化¹³。吳趸人在翻譯《電術奇談》時也表示：「原書人名地名，皆以和文諧西音，經譯者一律改過，凡人名皆改為中國習見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國地名，俾讀者可省腦力，以

免艱於記憶之苦」(郭延禮, 2001, 頁 553)。而蘇曼殊(1963)翻譯雨果(Victor Hugo)的名著《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書中人物金華賤、滿周苟、范桶、孔美麗，也都是中國化之後的人名。這樣的在地化作法，在晚清時期頗為常見。許多研究者過去常從讀者理解的角度來解釋這種現象¹⁴，認為譯者因為要考慮讓當時的中國讀者容易理解並接受翻譯作品，所以為了避免文化上的隔閡感，於是把故事背景與角色搬到中國，因而這種中國化的作法便普遍起來。

然而，如果進一步觀察這幾位採取中國化作法的譯者，會發現他們具有某些共同之處。梁啟超與蘇曼殊皆留學過日本，梁啟超的《十五小豪傑》是透過森田思軒的日譯本《十五少年》轉譯，蘇曼殊於1903年所譯的《悲慘世界》亦可能是透過日譯者黑岩淚香於1902年的日譯本《噫無情》轉譯而來。而吳趸人的《電術奇談》是日本人菊池幽芳所譯，方慶周譯成文言體，吳趸人再演述為白話體¹⁵。這幾本作品層層轉譯的命運與本研究關注的《馨兒就學記》不僅十分相似，而且其在地化的「翻案」手法亦如出一轍。換言之，晚清小說中國化的風氣當然有可能是因為譯者考慮到讀者的理解或接受而從中操縱，但從以上幾本小說的例子來看，更不能排除的原因是這些譯者都受到了日譯本與日譯者的影響。無論是森田思軒、黑岩淚香、菊池幽芳、杉谷代水，這些明治時期的譯者都採取了在地化的翻案策略，以至於根據他們的譯本而轉譯小說的晚清譯者梁啟超、蘇曼殊、吳趸人、包天笑，也跟著採取在地化的策略，把日本格調再轉為中國格調。

除了「在地化」的共同點之外，杉谷代水和包天笑對翻譯的態度也都不講求忠實。原文不重要，源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是否能為其所用。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傾向與當時的歷史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文中處處可見明顯的意識形態，無論是愛國情操、倫理關係、父權思想、階級意識，都試圖以明顯或隱而未見的方式影響讀者。然而外國的新元素進入本國文學系統之時，譯者不斷的在新舊之間抉擇，從新的文體到新的現代精

神，譯者必須決定自己要扮演創新還是守舊的角色。杉谷代水與包天笑都在兩者之間矛盾掙扎，他們一方面想要引進西方作品，拓展國內讀者的視野，學習新的社會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們又深怕本國舊有的優良傳統消失，所以從譯文中可以看出這種新舊雜陳互相矛盾的現象。杉谷代水引進了日記體的《學童日誌》，卻認為故事中添加書信體短篇在日本並不常見，因此刪去了所有主角父母及姐姐寫的信。包天笑添加的雛形國會情節，原有提倡效法西方議會制度之新意，然而全校女學生卻無參政權，僅能列席旁聽，理由是我國尚無女子參政。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百日維新都試圖破舊立新，但也讓這段過渡時期充滿了新舊的衝突與矛盾，這種矛盾情結自然也反映在杉谷代水與包天笑的譯作中。

除了新舊的矛盾，中國面對的難題要比日本更多，日本當時的勢力雖不及歐美國家，但至少也打敗中國，並且取得臺灣做為殖民地，因此日本也算是逐漸趕上西方列強的實力。相較之下，中國面臨的卻是一次次的戰敗，文人志士對外國勢力深惡痛絕，卻又急切想要學習西方，所以才會大量翻譯西方作品。然而他們在擁抱西方之際，卻也難以排解仇外的情緒。包天笑（1990，頁 460）想「乞靈於西方文化界」，卻又在書中醜化外國人為卑鄙惡徒，崇洋與仇外的兩股力量互相拉扯，與上述的新舊矛盾一樣，是晚清時期社會背景之下的特殊現象。*Cuore* 層層轉譯的過程打破了原文與譯文的界線，模糊了譯者與作者的角色，也將文學與教育工具融為一體。此時傳統「忠實」翻譯的概念已無法用來解釋這複雜的過程，或許以「翻譯即改寫」的概念來思考會更為適切。套用本雅明（張旭東譯，2000）的說法，每一篇譯作都是原作的來世生命（afterlife），英譯本、日譯本、中譯本都是義大利原作 *Cuore* 的來世，一方面有自己的新面貌，另一方面又彼此互相補充。透過譯者的操縱，「心」（*Cuore*）的轉變也意味著一種「新」的轉變，使這部作品在異地產生了新的影響與效應。

註釋

1. 包天笑，本名清柱，後改名公毅，號朗孫、包山，筆名甚多，包括吳門天笑生、天笑生、天笑、笑、秋星閣、釧影樓、餘翁、且樓、染指翁等。他在《馨兒就學記》使用的筆名為天笑生。
2. 據包天笑自述，馨兒的名字源自包天笑鍾愛的兒子可馨，不過此書寫到不及一半，未滿三歲的可馨便殤亡了（1990，頁460）。
3. 例如何楓琪（2007）的碩士論文《包天笑及其小說研究》，以及鄧如婷（2000）的碩士論文《包天笑及其小說研究》。
4. 例如姜思樂（2007）的〈包天笑編輯活動側影〉。
5. 張建青（2005）談論 *Cuore* 在中國百年以來的譯介時，不知《兒童修身之感情》其實就是《三千里尋親記》，原文出自 *Cuore* 五月份的每月故事。在張建青列出的 *Cuore* 百年譯介簡表當中，並沒有列入《兒童修身之感情》。此外，因為我找到了包天笑所根據的日譯本《學童日誌》，該書在1902年出版，所以包譯本出版的年代必然不可能早於1902年，因此張建青認為包天笑於1901年將《三千里尋親記》翻譯完畢，恐怕是錯誤的推論。事實上《三千里尋親記》這本書是否曾經存在都是一個疑問，而張建青卻說此書是中國最早譯介的義大利文學作品，這樣的結論說服力也很薄弱。
6. 梅家玲（2006）的〈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是少見的例子之一，此論文主要探討包天笑翻譯的教育小說以其嶄新的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為當時讀者開啟了迥然不同的教育視界。
7. 包天笑提到：「這時我每從青州回蘇州，或從蘇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經上海。到上海後，必常到虹口的日本書店，搜尋可譯的日文書，往往擁取四五冊以歸，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譯歐西各國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選取資料了。於是第一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苦兒流浪記》；第二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馨兒就學記》；第三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棄石埋石記》。」（1990，頁460）。此處包天笑對這三記的出版順序記憶有誤。第一部應為《馨兒就學記》，而第三部書名應為《埋石棄石記》。
8. 教育三記為《馨兒就學記》、《苦兒流浪記》、《埋石棄石記》。
9. 包天笑不但將書名記錯，而且還說書中談到很多理論，都是關於日本人對教育的看法，但此書其實是標準「優良教師」的故事，是情節性頗強的小說，重點不在談尊師重道的理論，反倒是著墨於青年春風化雨的事蹟（梅家玲，2006，頁166）。
10. 例如原文與英文本中有一貧苦同學的文具書本是市政府所贈，杉谷代水譯為御役所（鄉鎮公所）所贈，而包天笑則刻意改為主角馨兒所贈。
11. 原作、英譯本、日譯本書中的開學日當天，主角滿心不情願的來上學，心裡還一直想著放假的事，但包天笑的中譯本裡，馨兒只一心勉勵自己努力用功，以博父母歡心。
12. 1905年，由於美國國內歧視和虐待華僑、華工，廣州、上海工商界號召抵制美貨，進而形成廣泛群眾性的反美愛國運動。

13. 梁啟超的譯後語寫道：「英譯自序云：用英人體裁，譯意不譯詞，惟自信於原文無毫釐之誤。日本森田氏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調，然絲毫不失原意。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負森田。果爾，則此編雖焦士威爾奴復讀之，當不謂其唐突西子耶。」（羅新璋，1984，頁130-131）。
14. 王宏志（2005，頁87）談到晚清譯者與讀者的情況便指出，由於經過長期的封閉，晚清絕大部分的讀者對於西方的認識十分有限，因此即使譯者自己能完全理解原文的意義，也往往無法向讀者交代譯出語和譯入語在文化上的鴻溝。再者，由於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所以當時中國讀者對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可能會產生抗拒的現象。
15. 根據姜小凌（2005）的研究，此書先是日本作家菊池幽芳翻譯十九世紀的一部英國小說，於1897年譯為《新聞賣子》，連載於《大阪每日新聞》，然後由方慶周譯成中文文言體六回，再由我佛山人（吳珏人）衍義為白話體章回小說《電術奇談》，知新主人（周桂笙）點評，1903年發表於《新小說》雜誌第八期。

參考文獻

- 大英簡明百科（無日期）。**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2007年7月24日，取自 <http://sc.hrd.gov.tw/ebindra/Content.asp?Query=4&ContentID=2992>
- 王宏志（2005）。民元前魯迅的翻譯活動——兼論晚清的意譯風尚。載於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上海：東方。
- 包天笑（1990）。**鉤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
- 包天笑（天笑生）（1910/1976）。**馨兒就學記**。臺北：臺灣商務。
- 白春仁、曉河譯（1998）。巴赫金（M. M. Bakhtin）著。**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
- 何楓琪（2007）。**包天笑及其小說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
- 吳其堯（2003）。包天笑在清末民初的翻譯及其與創作的互動關係。**外語與翻譯**，3，14-22。
- 宋偉杰等（譯）（2002）。劉禾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
- 杉谷代水（譯）（1902/1938）。アミーチス著。**學童日誌**。東京：富山房。
- 沈慶會（2005）。《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一書中的幾個問題——兼與樂梅健先生商榷。**明清小說研究**，2，96-103。
- 林欣儀（譯）（2002）。高橋明郎著。日記體裁的學校小說：《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及《學校同學》。**臺灣文學評論**，2（1），260-273。
- 姜小凌（2005）。明治與晚清小說轉譯中的文化反思——從《新聞賣子》（菊池

- 幽芳)到《電術奇談》(吳趸人)。載於陶東風等(編),《文化研究(第五輯)》(頁193-207)。廣西:廣西師範大學。
- 姜思鏢(2007)。包天笑編輯活動側影。《中國編輯》,3,86-89。
- 柯榮欣(1990)。序。載於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臺北:龍文。
- 夏丐尊(譯)(2001)。亞米契斯(E. De Amicis)著。《愛的教育》(*Cuore*)。香港:三聯書店。
- 神田一三(無日期)。**包天笑「三千里尋親記」について**。2008年8月30日,取自<http://www.biwa.ne.jp/~tarumoto/k6204.html>
- 張旭東譯(2000)。本雅明(W. Benjamin)著。譯者的任務(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陳德鴻、張南峰(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頁197-210)。香港:香港城市大學。
- 張建青(2005)。***Cuore*中國百年(1903-2004)的譯介與接受**。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上海。
- 張建青(2008)。**晚清兒童文學翻譯與中國兒童文學之誕生——譯介學視野下的晚清兒童文學研究**。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上海。
- 梅家玲(2006)。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中外文學》,35,155-183。
- 郭延禮(2001)。**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北京:高等教育。
- 郭延禮(2004)。中國教育小說的初端。**20世紀中國近代小說在全球的傳播**。2007年7月24日,取自<http://www.jydoc.com/article/37980.html>
- 郭延禮(2005)。**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武漢:湖北教育。
- 陳平原(2006)。**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
- 楠山正雄(1902/1938)。アミーチス著。杉谷代水(譯)。解說。《學童日誌》(頁1-2)。東京:富山房。
- 廖咸浩(1996)。有情與無情之間:中西成長小說的流變。《幼獅文藝》,83,81-88。
- 鄧如婷(2000)。**包天笑及其通俗小說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
- 羅念生(譯)(1996)。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著。《修辭學》(*Ars Rhetorica*)。北京:三聯書店。
- 羅新璋(1984)。**翻譯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蘇曼殊(1963)。悲慘世界。《蘇曼殊全集》(頁D3-D89)。臺北:大中國圖書。
- De Amicis, E. (1895). *Cuore: An Italian schoolboy's journal* (I. F. Hapgood, Trans.). NY: Thomas Y Crowell & Company.
- De Amicis, E. (1908/2006). *Cuore*. Milano: Fratelli Treves.
- Free Dictionary (n.d.). *Hapgood, Isabel Florence*. Retrieved June 15, 2009, from <http://encyclopedia2.thefreedictionary.com/Hapgood%2c+Isabel+Florence>

Martens, L. (1985). *The diary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retti, F. (1987). *The way of the world: The Bildungsroman in European culture*. London: Verso.

New York Times (1895, December 18). *Schoolboys in Italy*. Retrieved June 15, 2009, from <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940CEEDA1139E033A2575BC1A9649D94649ED7CF>